第一部分　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青铜文化研究现状述评

新疆位于我国西部，地处亚洲腹地。在天山南北广大的区域里，曾经生活着众多的古代民族。考古发现已经表明，早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较早阶段——青铜时代，这里就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青铜文化。这些青铜文化由于其自身的独具特色，更由于它们存在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键性地域，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典型代表性文化，因此在我国青铜时代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新疆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早期的发现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一些外国探险家、考察队在新疆的考察工作，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都曾发现并记录过一些遗址和零星遗物。 50 年代，黄文弼等人在哈密焉不拉克遗址首次进行发掘，获得了一些陶器、铜器等实物资料[1]。这些工作显然具有开创意义。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新疆境内的考古调查工作时有进行，人们为找寻新疆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发现了一些含有彩陶和小铜器残件的文化遗存，但由于调查工作所获资料过于贫乏以及发掘工作的不足，对于一些青铜文化的面貌无法给以清楚的界定和较深入的探讨，人们对新疆境内青铜文化的发现，没能形成一些基本一致的认识。

70 年代开始，在东疆的哈密盆地、吐鄯托盆地、天山阿拉沟、鱼儿沟等地，南疆的帕米尔高原和焉耆盆地等地，相继发现了一大批青铜文化遗存，在众多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这些工作的进行，为青铜文化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使我们今天有可能对新疆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生、演进、发展、消亡等诸多问题，作一些研究和探索。

在新疆地区青铜文化发现的初始阶段，我国大部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尚属空白。一些外国学者对在我国所获资料的研究分析，多是参照西亚、地中海地区考古工作建立的标准，进行文化性质和年代的认定。这些比较研究中的错误，在其后的年代里大都得到了纠正，但是，在对这些错误进行批判时，未能判明这些比较研究工作中的合理成分，使得我们的研究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差倾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50 年代以来，在我国黄河流域及甘肃中西部地区的大量考古发现，表明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有着自己的彩陶文化传统，这些彩陶文化因素在发展到青铜时代时先后进入衰亡阶段。这一发现成果揭示了黄河流域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对于这一规律的盲目照搬，造成了新疆地区青铜文化研究中的某些混乱认识。由于对许多文化遗存的面貌缺乏总体上的认识，人们往往根据其发现中有无彩陶因素来确定年代和性质，将许多以彩陶因素为特点的文化遗存的年代都归入新石器时代阶段，一些研究文章也往往局限于定性方面的简单归类，很少涉及其他问题。

70 年代开始的大量发掘工作，使人们逐步认识到，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许多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青铜文化甚或是早期铁器时代阶段，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制作精美的彩陶制品，这些彩陶的制作风格及构图母题纹样，显然与周围地区的已知考古学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一发现表明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或许经历了与黄河流域及邻近地区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促使许多研究者对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重新思考。

首先是一些遗存的文化性质归属问题，许多研究者根据众多遗址发掘中彩陶与铜器或铁器共出的事实，并参照一些^{14}C 年代测定数据，提出这些含彩陶因素的文化遗存应分别属于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这种认识的形成，标志着新疆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工作，摆脱了中原发展模式的强大影响，走上了自身发展的轨道。这种认识无疑也是更接近于历史的事实。

在初步判定了诸多文化遗存的时代性质之后，我们面临着一种困惑，这就是当我们把已有的发现都作出重新界定之后，我们看到，这其中基本没有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存，从已知的^{14}C 测定年代数据看，没有相当于距今 4000 年以前的典型的陶器遗存。文化发展序列上的这种巨大空白，使我们在讨论文化来源问题时认识很不一致。由于搞不清各种遗存的早晚关系，每发现一处遗址，几乎都要使用一个新的文化命名，这不仅无益于已有问题的解决，而且极易造成新的混乱。在讨论文化关系问题时，由于 50 年代以来对文化西来说等观点的全面批判而形成的另一种偏差倾向，使人们在讨论边界相邻地区的古代文化发生、发展过程问题时，很少能客观的说明各种文化交流存在的可能，这使我们的讨论往往陷入一些人为的封闭圈里。

目前，对于新疆境内诸多青铜文化的研究，仍然处于材料的积累阶段，许多遗址的发掘材料还未能做细致的分类研究工作。这种现状，使得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还需待以时日，但自 70 年代以来的连续发现和部分材料的初步报道，已使一些问题的研究趋于明朗化。从宏观上来观察，首先是对已有各类发现的横向比较问题，在这种比较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大致可以区分出几个不同的文化区，每一个文化区内的各处遗存有较多的一致特点。例如，在发掘工作做的较多的东疆地区，我们可以看出，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和五堡水库墓地发现的遗存，有很多相似因素；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南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与木垒四道沟遗址、奇台半截沟遗址所出的陶器，有许多共同点；在吐鄯托盆地的鄯善洋海遗址、苏巴什遗址、吐鲁番艾丁湖遗址等地的发现，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文化因

素；天山阿拉沟东口的发现与阿拉沟西口附近的发现也多有相同之处；焉耆盆地的和静察吾乎沟口墓地及周围的许多地点，则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小区。

如果进而把几处相似因素较多的遗存作为一个文化单元进行分析，则不难发现，几者之间的关系一般可以概括为二种基本形态，即共存关系和发展关系。据现有^{14}C年代测定数据，东疆地区的哈密五堡、焉不拉克、本垒四道沟、天山阿拉沟、鱼儿沟等地点遗存的绝对年代都比较接近，约为距今3300～2200年前的这一历史阶段。可以肯定地说，在公元前两千纪下半叶到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这一时期，新疆境内发展起了若干支基本并行的青铜文化，这种格局是其后若干绿洲小国家形成的基础。如果从绿洲国家各自相对独具特点的文化传统反推其来源，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对于各类文化遗存间的发展演替过程的研究，必须以各单一文化遗存的年代分期研究、器物类型学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研究作为基础。这些基础的研究工作是当前新疆地区青铜文化研究中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目前尚未有较系统的文化分期研究成果发表。我们认为，从已发现的材料看，至少在东疆地区，这种文化遗存间的演替关系是有线索可寻的。

对新疆地区青铜文化源流问题的探讨，是研究工作的重点所在，因为，这些课题的研究进展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研究的关键，历来为学术界所瞩目。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我们认为，由于新疆地区地处我国中原和前苏联中亚两大文化圈的中介地带，因此对于新疆地区的文化发生问题的探讨应同时考虑到来自东西两方面的文化影响问题。新疆境内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距今4000年前的典型陶器遗存这一现象，一方面或许因为对这一阶段遗存的发现工作做得不够；一方面则表明，新疆境内已知的若干青铜文化的形成，有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可能。在东疆地区，我们发现，一些陶器涂红色陶衣、施黑彩的作风及彩陶图案的母题花纹，同甘青地区较早阶段或相同时期的含彩陶因素的遗存有许多相似因素，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或许可以阐明它们之间的文化联系。在北疆阿勒泰地区的一些发现，明确显示了与前苏联南西伯利亚地区文化遗存的一致性。在伊犁河流域的一些发现，与在前苏联七河地区的发现关系密切。这些情况表明，至迟在青铜时代，新疆地区的文化遗存已同东西方的一些主要文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如果仅就目前发现的材料作对比分析，大体可以认为，东西方的一些主要文化，都对新疆境内的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或许可以完整揭示中原传统文化因素的西渐和中亚文化因素东渐的历史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排除新疆境内一些土著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最近，在和静察吾呼沟墓地发现的以一种带流彩陶罐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研究者认为是一种极具地方特点的文化遗存。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存在着土著文化因素的一个证据。即使在这样一种极具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中，仍然可以看出存在着来自于东西两个方向的文化因素。新疆境内青铜文化构成因素的多源性和复杂性，迫使我们在对每一个单一文化遗存进行系统研究的同时，必须对周围地区的发现给以足够的注意，若要较好的从宏观上把握问题，每一个研究者都需对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研究的进展状况，对中亚、南西伯利亚地区青铜文化

研究的进展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和基本的认识。

目前，对新疆境内青铜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于对各种文化遗存族属问题的认定。就发表的文章来看，已有对乌孙、塞克、姑师、车师、匈奴等古代民族及其代表性文化的若干讨论。由于汉文文献对于汉代以前西域各少数民族活动的记载比较贫乏，仅仅依据文献描述，很难将西域各古代民族的文化遗存作明确的区分，也难以形成一些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只有先将已有的各类发现在考古类型学方面作出明确的区分，在年代顺序上、空间分布上作出明确的界定，才能使对族属问题的讨论在相对一致的基点上展开。因此，首要的工作，依然是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

由于现在发现的多为墓葬材料，极少见到有关居住址和社会组织结构方面的材料报道，使我们对已知各种青铜文化遗存的社会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等问题难以作全面的分析。在前苏联中亚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在一些农业区已经历了城市化发展过程，发现有大面积的城镇遗址和大量的多间结构的土坯房屋，有发达的灌溉系统。在我国甘青地区，这时期的一些青铜文化，则多为小规模半游动性质的文化，少有大规模的定居营地和大量房屋遗址的发现。目前，在东疆地区的鄯善洋海遗址、哈密焉不拉克遗址等地都发现有将土坯用于墓葬结构的现象，说明这时期出现土坯结构房屋的条件已经具备。在今后的调查工作中，应着重于对含有土坯结构建筑的发现及其年代问题的断定。已知材料表明，土坯制作技术向东的传播这一时期已达到青海湖西边的诺木洪地区[2]，因此，在东疆地区发现这一时期的土坯房屋居址应该是可能的。另外一些以游牧经济为特点的青铜文化遗存，其居住址的存在方式，或可与甘青地区的情况有一致的特征。

在新疆地区各种青铜文化遗存中，已经有一批遗址中发现有铁制品的存在，鉴于目前有关的材料多未发表，这些铁器的性质和种类还不十分清楚。距今 3000 年前后在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中多次见到铁器这一现象是应该引起充分注意的研究课题。在甘青地区约相同阶段的诸青铜文化遗存中，仅在沙井文化遗存中发现有少量铁制品，这类遗存的绝对年代，据 ^{14}C 测定，最早的一个数据是距今 3100 ± 180 年，一般多在距今 2900～2600 年之间。这与东疆一些遗存的年代数据相比，约为同时或偏晚。在河西地区较早阶段的四坝文化遗存中，尚未见有发现铁器的报道，因此，就目前材料看，新疆地区铁器产生的东来影响因素还难以肯定。南西伯利亚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塔加尔文化的年代上限，可以早到公元前第一千纪之初这一时期，但发现铁器的遗存属于塔加尔文化第二期阶段，其年代上限约当公元前五世纪，这与新疆地区一些偏晚的青铜文化遗存的年代比较接近，因此，新疆地区铁器产生的北来影响因素也难以肯定。前苏联中亚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开端，是在约当公元前一千年前后的第二次都市化阶段，在中亚地区，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发展关系序列已基本建立，许多研究表明，中亚地区冶铜技术的发展，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发达的工艺水平，铁制品的出现，是这些文化发展到这一阶段的自然结果。这种先进的工艺技术逐渐向东北方向的传播，有着极大的可能

性。所以说，在考察新疆地区铁器的来源问题时，应对中亚地区的发现给以足够的重视。由于目前对一些铁制品的研究还不充分，确定新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必须十分谨慎。

新疆全境的文物普查工作正在深入进行，新的发现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各种青铜文化遗存的已有认识。对于新疆地区乃至中国西部青铜时代的全面考查和深入研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只有将新疆的工作摆在中西早期文化交流的广阔历史舞台上，才能展示出这些工作的深远意义。在新疆地区的这些发现，正如它们已经在历史上曾经表现出的那种巨大作用一样，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原载《新疆文物》 1989 年 4 期）

注　　释

[1]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3 年。

[2] 青海省文管会等：《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 1963 年 1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
—— 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

一、绪　　论

公元前 2世纪，汉使张骞凿空西域[1]，由此开始了长达 1000 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条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的文化传播路线，现在习惯上称之为“丝绸之路”。对于丝绸之路及中西文化交流历史进程的全面考查和研究，正在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投身其中。然而，由于各种文献记载的贫乏，一般学者对于凿空之前的西域历史和文化，对于丝绸之路开辟之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往往难以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这种困局的打破，只是近 10 年之事，由于在新疆各地的大量考古新发现，对于上述问题的深人研究，已有了较大的可能性。

对于新疆境内早期文化的探索，自 20 世纪初的探险活动发端，已经历了比较长的材料积累阶段。由于在这一非常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多有高山、戈壁、大沙漠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因此在新疆考古发现的最初阶段，多数工作仅仅具有探险的性质。在这些探险考查活动中,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斯坦因（Stein Aurel 1862～1943)和我国学者黄文弼等人，都曾发现过一些早期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在随后的一个阶段内，考古调查工作不断进行，新的早期文化遗址时有发现，但研究工作往往局限于对各种发现年代和性质的简单归类，近 10年来，新疆地区早期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工作，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加强，一批批新材料不断出现，丰富了人们对新疆境内早期文化的认识。就目前发现的这些材料来看，其文化性质多数应属于青铜时代的范畴，因此，对新疆诸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消亡以及同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自然提上日程。本文正是试图利用考古新发现的材料，对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对早于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也作一番探讨。

二、文化分布区的划分及各区诸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

新疆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所谓汉初三十六国的记载[3]，说明当时这一地区民族复杂、文化多样。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新疆诸青铜文化的面貌呈现

了各不相同的基本特征，显然，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存在的青铜文化，有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发展区系，因此在对新疆诸青铜文化的总体面貌作宏观考查时，首先应对不同的文化区作出基本的划分。

新疆境内各不相同的青铜文化遗存，其分布特点表现出了与地理环境状况的有机联系，往往是在同一种地理环境中存在的文化遗存之间有较多的一致特征，这说明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地理环境状况有极大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对于西汉时西域各国政区特点的研究表明，形成城郭诸国小而分散，不相统属的特性，也是西域地区特殊地理景观的产物[4]。这种制约作用的长期存在，在中国西部广大的内陆地区表现得比其他地区更加明显和突出。基于这种认识，对于新疆各青铜文化区系的划分，将首先依据不同的地理环境状况作一番考查，下面我们将对各典型区域逐一加以分析，基本地形要素请参见图一。

1．哈密盆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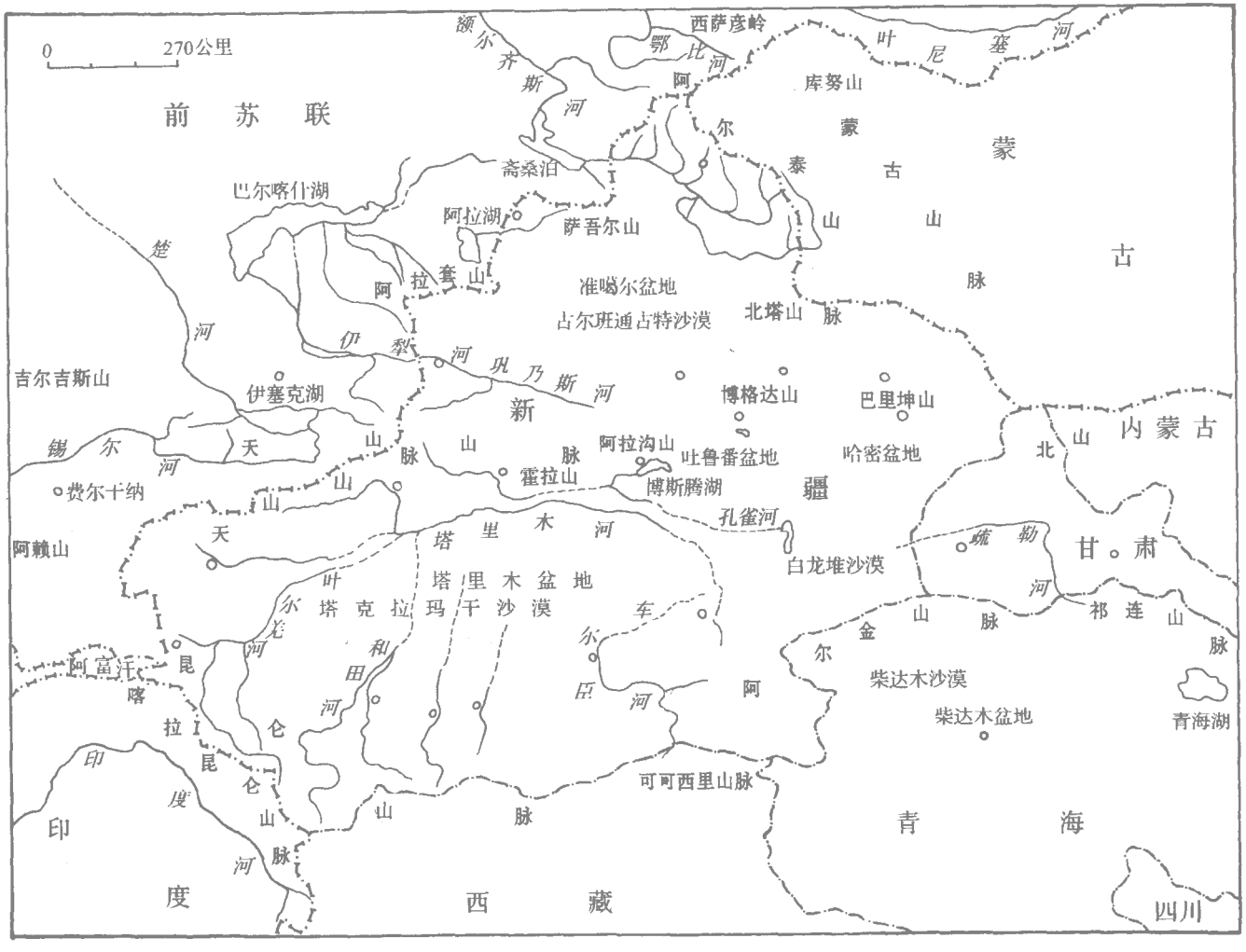
哈密盆地位于新疆东部，东与甘肃西部相接壤，北依天山余脉—— 巴里坤山，南临大戈壁及罗布淖尔地区，盆地内多为戈壁荒漠景观，仅盆地中央为绿洲。已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多位于古今绿洲及其边缘地带，20 世纪 50 年代黄文弼等人首次在三堡焉不拉克遗址作试掘工作[5]，1986 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该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研究者据此提出了焉不拉克文化的概念[6]。

在哈密盆地比较重要的发现还有 1976 年[7]、1986 年[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对五堡水库墓地的发掘；1988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哈密雅满苏矿林场办事处墓地的发掘[9]；1983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改名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四堡拉甫乔克墓地清理的 1 座残墓[10]。在历年的文物普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出彩陶及小件铜器的青铜文化遗址，如五堡哈拉墩遗址等[11]。

哈密市雅满苏矿林场办事处（以下简称雅林办）墓地 1988 年共发掘墓葬 35 座，材料尚未全部发表，据报道[12]，墓葬形制分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土坯墓两种，葬式为侧身屈肢，多单人葬。陶器均手制，器形有杯、罐、壶形器等，彩陶为紫红彩，施红色陶衣，构图纹样多为三角纹。还见有小件铜器、骨器、石器等随葬品，少数墓随葬羊骨。

哈密市五堡水库墓地 1976 年、1986 年两次共发掘墓葬 82 座，据介绍[13]，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单人侧身屈肢葬。随葬品多为毛皮衣物、石器、木器和小件铜器。陶器较少，夹砂红陶，器形有罐、豆、壶几类，彩陶为红色陶衣，施黑彩，构图纹样多为各种三角纹。随葬品中还见有随殉的牛、羊、马骨及食品等物[14]。

哈密市三堡焉不拉克墓地 1957 年发掘墓葬 14 座，1986 年又发掘墓葬 76 座，两批材料均已发表[15]。墓葬形制有三种：竖穴二层台墓、竖穴土坑墓和土坯墓。多为单人侧身屈肢葬。陶器均手制，夹砂红陶，器形有单耳罐、单耳杯、钵、壶、豆、双耳罐、碗等。彩陶所占比例较高，多为红衣黑彩，纹饰有三角纹、曲线纹、 S形纹，有的施内



图一　新疆及邻近地区地形要素示意图

彩。铜器等多为小件器物，木器中有一些男女木俑。

哈密市四堡拉甫乔克墓地 1983 年仅清理 1 座残墓，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单人葬，随葬品只有 2 件陶器和 1 枚小铜锥。陶器为夹砂红陶，手制，红色陶衣施黑彩，构图纹样为连续折线纹和竖向条带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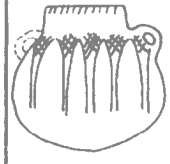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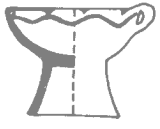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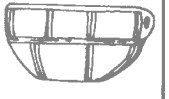
综合上述遗址的发现可以看出，哈密地区已知的各处青铜文化遗存，都是以竖穴土坑墓为其特点，其中部分墓地有使用土坯结构的现象，葬俗主要为单人侧身屈肢葬。对于随葬陶器的比较，更能看出这些遗存间的共同因素（图二）。若以发掘资料中陶器最多的焉不拉克墓地遗存为基本类型，通过归类，可以列出八种基本器形：双鼻耳罐、单耳桶形罐、单耳长颈罐、双耳盆、单耳罐、单提耳豆、腹耳壶和单耳钵。把五堡水库墓地的陶器与之相比，可以发现有五种器形基本一致，即双鼻耳罐、双耳盆、单耳罐、单提耳豆和腹耳壶，对铜器、骨器、石器及毛皮织物的比较也显示了较多的一致特征。可以肯定，这两处遗址应是同一类遗存。

雅林办墓地的陶器有五种可与焉不拉克墓地的陶器划归一类，即双鼻耳罐、单耳桶形罐、单耳长颈罐、双耳盆和单耳罐。由此可知，这两种遗存具有较多的共同因素，特别是两地的墓葬中均使用了土坯结构，显示出完全相同的特点。但是，雅林办墓地的陶器群中所有的带注的双耳罐（也被称作壶形器）、四耳罐等器形不见于焉不拉克墓地遗存中。在彩陶风格上，雅林办墓地所见的松针状构图纹样和弧线三角纹构图母题也不为焉不拉克墓地遗存所具有。所以说，雅林办墓地的遗存实际上有两类构成因素，除前述第一类因素等同于焉不拉克墓地遗存外，后一类因素则不同于焉不拉克墓地遗存。由此看出，在哈密地区已知的青铜文化遗存，主要都是焉不拉克类遗存，雅林办墓地所具有的第二类文化因素，不是这一地区青铜文化的主流，关于这一类遗存，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将予以讨论。

2. 吐鲁番盆地区

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盆地习惯上也叫作吐鲁番盆地。位于新疆东部，东与哈密盆地接邻，西、北及西南面被天山山脉围绕。盆地为一处封闭的凹地，中心地区的艾丁湖海拔高度为负值。盆地内多为干旱的荒漠戈壁景观，仅在湖滨及靠近河流的山口地带形成绿洲。青铜文化的遗址多位于绿洲环境之中。

1959 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对吐鲁番市阿斯塔那遗址进行了调查[16]，其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对吐鲁番市艾丁湖墓地[17]、鄯善县苏巴什墓地[18]、托克逊县英亚依拉克墓地[19]、托克逊县喀格恰克墓地[20]、鄯善县洋海墓地[21]等地点进行了发掘。最近的文物普查工作表明，青铜时代的遗存在盆地内有广泛的分布，重要的遗址还有吐鲁番市恰什塔格墓地、托克逊县小草湖遗址、乔拉克坎儿井村遗址、科普加依（也叫“克尔间”）遗址、鄯善县东巴扎遗址、苏贝希遗址及墓地、吐格曼博依墓地、奇格曼墓地等地点[22]。

	双鼻耳罐	桶形罐	长颈罐	双耳盆	单耳罐	豆	腹耳壶	单耳钵
雅林办墓地	 T12M15	 89HLBM3	 88IILBT17:?	 88HLBM32:2	 89IILBT7:?			
五堡水库墓地	 哈博展品			 哈博展品	 哈博展品	 哈博展品	 哈博展品	
焉不拉克墓地	 C:6	 T3:1	 M31:3	 M60:1	 M2:2	 M69:5	 M75:18	 T1:14
拉甫乔克墓地								 《简报》标本

图二　哈密盆地区各遗址陶器的比较

1980 年在鄯善县苏巴什墓地清理了 8 座墓，1985 年又对遭破坏的 50 余座墓的陶器进行了征集[23]。墓葬为竖穴土坑墓，葬俗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有陶器、小件铜器、骨角器、木器、毛皮织物、弓箭和金箔饰件等，金箔饰有圆形虎纹金箔和长方形卧虎纹包金箔铜牌饰。陶器手制，夹砂红陶，多素面陶器，彩陶红衣黑彩，构图纹样多是各种变形三角纹，主要器形有单耳钵、单耳长颈罐、单耳罐、双鋬耳钵、圜底钵、单耳桶形杯和单耳圜底罐等(图三)。

1980 年在吐鲁番市艾丁湖墓地清理了 50 座已被扰乱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石器和金箔饰等种类，陶器手制，夹砂红陶为主，彩陶为红衣黑彩，纹饰主要是各种三角纹、条带纹和网格纹，主要器形与苏巴什墓地基本一致，惟在此墓地还见有豆、鼎、勺等器类。

1988 年在鄯善县洋海墓地清理发掘了 88 座墓，在此之前还曾收缴了一批出土于此遗址的被盗文物。墓葬多为竖穴土圹墓，个别大墓在墓圹外围用土坯砌一圆形圈子。葬俗多为单人仰身屈肢葬，也有多人二次葬及丛葬，在此墓地发现了许多圆木棍绑扎成的葬具，也有的墓以苇席裹尸或覆盖墓口。发现各类随葬品较多，其中陶器均手制，夹砂红陶，彩陶为红衣黑彩，构图纹样多为三角纹、条带纹、网格纹等。与苏巴什墓地的陶器相比，主要器类完全一致，另见有单耳豆、单耳圈足罐等器类。

1983 年在托克逊县喀格恰克墓地发掘了 15 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因人骨保存欠佳，多数墓的葬俗不明。一般墓口用木棍棚架，上用苇席封盖，其上再铺干草、堆土并放置卵石，随葬品中陶器占大宗，均手制，夹砂红陶，彩陶比例较高，红衣黑彩，构图纹样多为各种三角纹、条带纹、网格纹和涡纹，与苏巴什墓地相比，有 6 种器形即单耳钵、单耳长颈罐、单耳罐、双鋬耳钵、单耳桶形杯和单耳圜底罐的造型风格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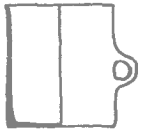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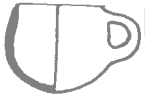
上述 4 个墓地表现出的一致因素是很明确的，墓葬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单人仰身直肢葬或屈肢葬为主，葬具多用木棍绑扎成的棺床，或用苇席包裹。在洋海墓地所见的用以棚盖墓口的苇帘，每根苇子长度可达 2 米以上，这种高大的苇子只在盆地中心的湖滨地区可以生长，因此是吐鲁番盆地独有的葬具用材。陶器多为圜底或平底作风，器类主要是单耳的罐、钵、杯等，从普查所获资料来看，在盆地内众多青铜文化遗址中的陶器，都具有这种共同的风格。我们可以认定，吐鲁番盆地内存在的青铜文化是一种以苏巴什墓地遗存为代表的青铜文化。

3. 巴里坤草原区

巴里坤草原位于新疆东部的天山以北地区。天山北坡有发育良好的山地植被，山前地带有大面积的缓坡冲积扇，这种环境是古代游牧民的理想栖息地。沿天山北坡西行，是从东疆进入天山腹地及北疆地区的自然通道。

在这一地区发现并经过试掘的青铜文化遗址有木垒县四道沟遗址[24]、奇台县半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单耳钵	单耳长颈罐	单耳罐	双鋬耳钵	圜底钵	单耳桶形杯	单耳圜底罐	豆
苏巴什墓地	 85SASM:1	 M8:5	 85SASM:13	 M8:9	 85SASM:18	 M3:7	 85SASM:8	
洋海墓地	 87CYP:1.B	 87CYP:2	 87CYP:78	 87普查标本:2	 87CYP:67	 87CYP:75	 87CYP:72B	 87普查标本:10
艾丁湖墓地	 M48:1	 M20:1	 M33:2	 M35:1	 M19:1	 M31:2	 M39:1	 M0:5
喀格怡克墓地	 83TOHM8:1	 83TOHM13:5	 83TOHM3:1	 83TOHM15:2		 83TOHM13:1	 83TOHM5:1	

图三　吐鲁番盆地区各遗址陶器的比较

沟遗址[25]、巴里坤县南湾墓地[26]和巴里坤县兰州湾子遗址[27]等地点。调查所见的重要遗址有巴里坤县石人子乡遗址[28]、伊吾县卡尔桑遗址[29]、伊吾县军马场遗址[30]和奇台县红旗厂遗址[31]。

1976 年和 1977 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两次试掘了木垒县四道沟遗址，揭露面积 200 平方米，发现墓葬 4 座和部分灰坑、灶坑、柱洞，但没有关于房子的材料见于报道。墓葬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俗为单人葬。还见有竖穴偏洞室墓，墓室中间用大块卵石堆砌一道石墙,将墓室分为南北两部分,仅北部墓室内葬有一成年女子和两个孩子。

遗址和墓葬中的出土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等种类，陶器手制，有的可见泥条盘筑痕迹，夹砂红陶为主，彩陶为红衣黑彩，构图纹样有交错网格纹和条带纹等，基本器形有双耳釜形罐、腹耳壶、双耳深腹罐、单耳罐、钵、球腹罐和彩陶罐等（图四）。

1974 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奇台县半截沟遗址试掘了一个探方，出土物主要有石器和陶器，陶器为夹砂红陶，彩陶为红色陶衣，深红或紫红色彩，构图纹样主要是连续倒三角纹和网纹。与四道沟遗址的陶器相比，有五种器形即腹耳壶、双耳深腹罐、单耳罐、球腹罐和彩陶罐作风基本一致。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于 1981～1982 年在巴里坤县奎苏南湾墓地清理发掘墓葬 98 座，多为竖穴土圹墓，有单人葬和合葬几种葬俗，已发表的合葬墓 M95 的葬具是由圆木做成[32]。随葬品有陶器、小件铜器和石器，陶器为夹砂红陶，彩陶为红衣黑彩，构图纹样有三角纹，连续折线纹、涡纹等，与四道沟遗址的陶器相比，有五种器形比较接近，即釜形罐、双耳深腹罐、单耳罐、钵和彩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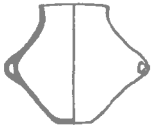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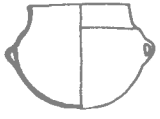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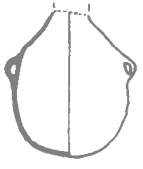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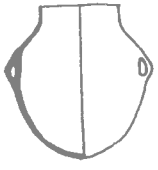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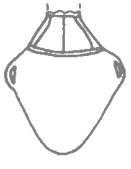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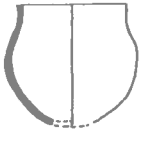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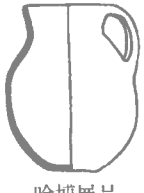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 1983 年在巴里坤县兰州湾子遗址发掘出一个石头建筑遗迹[33]，建筑结构平面呈圆形，用卵石围砌而成，在这一建筑遗址中发现了一些铜器和陶器，铜器有双耳深腹高圈足铜釜[34]、小刀和小饰件。陶器较少，仅见单耳罐一种器类，夹砂红陶，与四道沟遗址陶器的整体作风基本一致。

上述比较表明，在巴里坤地区存在着以四道沟遗址遗存为代表的一种青铜文化，其陶器以各种双耳或无耳的圆腹圜底器为主要的造型特点。墓葬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较大的墓中有框架结构的木质葬具，建筑基址是以卵石围砌的圆形建筑，铜器中已开始出现大型容器——铜釜。

在奇台县坎儿子大队四队土丘遗址，曾发现有另一类青铜文化遗存[35]，陶器为夹砂黑褐陶，手制，器形主要为圜底罐等，器表饰菱形划纹、竖向或横向斜条划纹和篦纹。据现有发现显示，这类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北疆的阿勒泰地区，在奇台的这一发现说明，这类遗存分布面的南界可以达到巴里坤地区西北部。

4. 阿勒泰草原区

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北侧。阿尔泰山脉南坡地带分布有植被较好的高山牧场，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湖滨和河岸地带，是发展渔猎、采集经济的理想环境。

	双耳罐	釜形罐	腹耳壶	双耳深腹罐	单耳罐	钵	球腹罐	彩陶罐
南湾墓地	 哈博展品	 哈博展品		 哈博展品	 新博展品	 新博展品		 新博展品
四道沟遗址		 T5:43	 T3:29	 T6:45	 T2:23	 T5:44	 T6:01	 T2(4)
半截沟遗址			 新博展品	 《简报》标本	 新博展品		 《简报》标本	 《简报》标本
其他遗址					 哈博展品			 《简报》标本

图四　巴里坤草原区各遗址陶器的比较

沿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下，是进入哈萨克斯坦及南西伯利亚地区的重要通道，向东行可沿阿尔泰山南坡的山前地带进入东疆。

由于气候寒冷，这一地区难以发展早期的定居农业经济，考古调查很难碰到较大的文化遗址，目前仅发现一些石棺、石人墓地，最重要的发现是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墓地[36]，其主要代表性遗存是该墓地的 M16。另据介绍，最近在塔城地区也发现了与之相同的遗存[37]。克尔木齐墓地主要为石棺墓，即用石板围成石棺，地表有的有封土，单人葬。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石器和骨器，铜器只见有小铜条。陶器手制，夹砂黑褐陶，胎壁厚重，器形简单。器表多饰细密的划纹、篦纹、刺点纹和凹弦纹，常见器形为圜底罐、深腹钵和圈足碗，也有相同器形的石制容器。石器中还有两边打刃的三角形镞、小型石刻人像制品等。

这类遗存所反映的特征，显然有别于已知其他地区存在的几种青铜文化，而在阿勒泰地区，目前也没有发现其他青铜文化遗存的分布，因此可以确知，在阿勒泰地区存在的是以克尔木齐墓地 M16 为代表的一种青铜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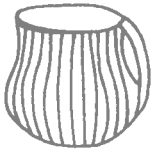
5. 天山中部山谷区

横亘东西的天山山脉是分隔南疆与北疆的自然地理屏障。在天山中部存在着一些贯穿南北的山谷和走廊地带，这些山谷大多成为古往今来人们翻越天山的自然通道。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为配合基本建设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一些发掘工作，在阿拉沟-鱼儿沟墓地[38]、乌拉泊水库墓地[39]、东风机械厂墓地[40]和阿拉沟大型木椁墓[41]等地点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这一地区还屡次出土一些铜器[42]。调查所见的重要遗址有乌鲁木齐市温格尔霍拉墓地、鱼儿沟南岸铜矿墓地、迪根萨拉沟口墓地和一道沟口墓地等地点[43]。

1976～1977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的阿拉沟-鱼儿沟墓地（以下简称鱼儿沟墓地）共发掘墓葬 76 座，均为竖穴石室墓，上部盖木，石室以卵石砌成，口小底大，平面近圆形。一般直径 2～3 米，深约 2 米。葬俗有两种，丛葬和单人葬。丛葬墓埋人人骨可达二三十具，上下叠压，大多是肢骨零乱不全；单人葬墓中发现有棚架式葬具。随葬品有陶器、小件铜器和木器等种类。陶器手制，夹砂红陶为主，彩陶为红衣黑彩，构图纹样主要是各种三角纹、涡纹和条带纹，基本器形可分为七种，计有单耳长颈罐、单耳罐、豆、壶、盆、钵和单耳桶形杯，其中各类单耳器的数量较多（图五）。

1983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泊水库墓地发掘墓葬数十座，墓葬形制有竖穴石棺和竖穴土圹墓两种，单人葬或合葬。随葬品有陶器、小件铜器、木器等种类。陶器手制，夹砂红褐陶，多素面，彩陶红衣黑彩，构图纹样有倒三角纹、涡纹和条带纹，器类有单耳长颈罐、单耳罐、双耳罐、壶、盆和钵等，其中单耳长颈罐、单耳罐的造型及彩陶纹样与鱼儿沟墓地的同类器物完全一样，而双耳罐、壶、

	单耳长颈罐	单耳罐	豆	双耳罐	壶	盆	钵	单耳桶形杯
鱼儿沟墓地	 76WYM72:46	 77WYM38:?	 《新考卅年》图版38		 76WYM5:2	 76WYM5:6	 77WYM38:13	 76WYM1:4
乌拉泊水库墓地	 《新民文》149	 《新民文》150		 《新民文》152	 《新民文》151	 《新民文》154	 《新民文》158	
东风厂墓地	 《新民文》145	 《新民文》144	 《新民文》134					
阿拉沟木椁墓	 77WYM30:3						 77WYM30:27	

注:《新民文》——《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新考卅年》——《新疆文物考古三十年》。

图五　天山中部山谷区各遗址陶器的比较

盆、钵等器物均为素面，表面装饰乳钉、鋬耳、竖纽及附加堆纹，这种作风显然有别于鱼儿沟墓地的遗存。

1984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阿拉沟东风机械厂墓地发掘 41 座墓葬和 2 个祭祀堆遗迹，墓葬绝大多数为椭圆形竖穴石室墓，少量为矩形石室墓，还有两例为竖穴土圹墓。墓口一般盖木或积石，积石墓的墓内均为层层填石，葬俗以丛葬为主，也有单人葬。少数墓在封堆中发现人骨架，并有随葬品。墓葬随葬品的种类较多。其中陶器手制，夹砂红陶，彩陶为红衣黑彩或红彩，构图纹样有三角纹、网纹、涡纹和条带纹，基本器类有单耳罐、长颈壶、钵、釜、碗、杯、盆、豆等。据已发表的材料看[44]，单耳长颈罐、单耳罐与鱼儿沟墓地的同类器形完全一样。豆为单耳浅盘高圈足，与焉不拉克墓地遗存中豆的风格基本一致（图二）。

1976～1977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阿拉沟口墓地清理了 4 座竖穴木椁墓，地表有用块石堆成的圆形封堆，封堆周围有矩形石围。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室上层为卵石和巨形块石填压，积石下为木椁，以圆松木纵横叠置而成，一般葬 1 人或 2 人。随葬品有金、银、铜、陶、木器等，还有丝织物、漆器和牛羊骨骸。金器数量较多，均为各种形状的牌饰和金箔饰物，银器为怪兽面纹银版。铜器有大型喇叭形方座承兽方盘。陶器较少，手制，泥质红陶，素面磨光，器形有带流筒形壶、平底盆（钵）、三足钵和单耳长颈罐。此外还有一些珍珠和玛瑙饰物。这 4 座竖穴木椁墓中的大量金银制品，在新疆境内属首次发现，目前尚无对比资料。方座承兽方盘在伊犁河流域曾有发现[45]，陶器中的单耳长颈罐、钵等类器物，可与鱼儿沟墓地的陶器作一些比较。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发现，在天山中部的山谷和山间盆地中，主要分布着以鱼儿沟墓地遗存为代表的一种青铜文化，这种文化遗存的墓葬以石室墓为特点，实行丛葬或多人合葬。随葬品中陶器的器类简单，多是各种单耳器。这类遗存中发现有多种其他青铜文化的因素成分，如在东风厂墓地所见的竖穴土圹墓和单耳高柄陶豆、大型木椁墓中发现的铜方座承兽方盘、乌拉泊水库墓地所见的一些素面陶器等，这表明鱼儿沟墓地为代表的这种青铜文化构成因素相当复杂多样。阿拉沟大型木椁墓从墓葬形制及葬俗看，与鱼儿沟墓地遗存属同一个文化,两者在随葬品中的差别或许归因于墓葬等级方面的差别所致。

6. 伊犁河谷区

发源于天山中部的伊犁河向西流入巴尔喀什湖，流域内的上游地区有发育良好的山地植被，是著名的高山牧区。中下游地区河谷两岸地势开阔，沿伊犁河谷西行，是进入中亚七河地区的主要通道，而该河上游的东、南、北三面，均被天山环抱。

60 年代开始，在昭苏县夏台、波马等遗址[46]对广泛分布的大型土墩墓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其后又对察布查尔县索敦布拉克墓地[47]、新源县铁木里克墓地[48]、尼勒克县哈拉图拜墓地[49]等地点进行了发掘。这一地区还多次出土铜釜等大型铜器，较重要的发现有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一批铜器[50]、巩留县出土的一批铜兵器[51]和尼勒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